

第二章 先秦



第一节 社会背景

夏商周时期，中原进入了奴隶社会。居住于广西的百越诸族与中原王朝已有所交流。《逸周书·王会》记载：“仓吾翡翠，翡翠者，所以取羽。”该句所记述的是周武王建立周朝时，百越仓吾族曾向周王朝进献翡翠。而广西出土的一些商代晚期的铜卣，与中原地区出土的较为相似，则是当时广西地区与中原地区文化交流的物证。

战国时期，百越地区出现了西瓯、骆越两大方国或部落。《史记·南越列传》记南越王赵佗：“佗因此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其东闽越千人众号称王，其西瓯骆裸国亦称王。”西汉刘安的《淮南子》记载秦始皇平定岭南时也说：“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西瓯又叫“西呕”，大致分布在现桂江流域和西江中游浔江流域一带。骆越则大致分布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雷州半岛和海南，以及越南北部和中部。陆川、博白、灵山、合浦、玉林、贵港等县市汉时则属于西瓯、骆越交错聚居的地区。

先秦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不平衡的现象，百越地区逐渐落后于中原。不过在社会分化这一点上，百越地区与中原地区一样，百越部落的内部也出现了贫富和贵贱之分。而这一时期已领先的中原文化，则开始向百越地区传播，最早是沿着从湖南道州经龙虎关流入广西恭城的茶江，到平乐汇合于漓江这一路线传播的，这是中原文化传入岭南的走廊之一。桂东北部地区的先民由于受到中原文化尤其是楚文化的影响，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水平较高，而桂西部地区的人们仍然过着落后的生活。

第二节 美术概况

先秦时期被称为“青铜时代”，是早期中华文明走向辉煌的重要时期，其历史遗存的代表器物为青铜器。青铜器的出现，不但使生产力和文明程度得到极大的提高，而且使人类的造型艺术得到了空前发展，并创造了辉煌。我们难以想象古人的艺术创造力和审美高度，不论是日常实用器具、兵器还是礼器，在其生产制造过程中，都体现了极高的造型水平和艺术水平，实现了功能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在审美高度和艺术价值上，创造了一个难以超越的时代。我们看到的每一件青铜器都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并且形成了鲜明的时代文化特征和审美特征。这种超越时空和文明发展整体水平的现象，其成因至今使我们困惑。广西青铜器出现的时间比中原地区稍晚，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是商末周初的，但实际上，广西青铜器的普遍制造应是从西周中晚期才开始的，制造方法应是受中原影响为主。不管受何种影响，广西青铜器在发展中仍体现了广西的地域特点，比如在器具上使用青蛙造型。青蛙是广西壮族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的崇拜物和图腾，它不但是农耕文明的象征，而且是宗族繁衍的信仰体现。广西许多少数民族没有统一的宗教信仰，因此记录并传播本民族的神话和对自然的崇拜就成为民俗，这种民俗形成了广西地域的审美和价值观念，于是，在青铜器的制作上也融入了这种文化和审美的特点。

商末周初的青铜器广西出土较少，主要为铜卣。铜卣是一种盛酒器，是用来祭祀祖先和神灵的，只见于商代和西周前期，在这之前和之后都没有出现过，具有很强的时代性。武鸣区和兴安县均有铜卣出土，其器形、纹饰、铭文均有明显的中原文化色彩，应是从中原传入的。

西周中晚期，广西的青铜器逐渐多起来，荔浦县、陆川县、宾阳县出土有铜尊，上林县有铜壶，灌阳县有铜铙，贺州市有铜罍，忻城县、横县、宾阳县、北流市、岑溪市有铜甬钟，武鸣区、灌阳县有铜戈，柳州市有角形器等。

春秋时期，广西的青铜器更多，南宁市、柳州市、宾阳县、横县、恭城瑶族自治县、武宣县均有出土。尤以1971年恭城县嘉会公社（今恭城瑶族自治县嘉会镇）秧家村金堆桥一座春秋晚期墓出土的青铜器最为精美。

战国时期，广西青铜器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平乐县银山岭，贺州市六合，岑溪市花果山，象州县下那槽，宾阳县韦坡，武鸣区安等秧岭，田东县锅盖岭、虎头山、南哈坡、大岭坡等地的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的墓葬，均有不少青铜器出土。战国晚期，这时虽然已进入铁器时代，在相邻的楚国先进的冶铁技术影响下，广西也能制造部分铁器，但大量生产和使用的仍是青铜器。

先秦时期，广西的青铜器有三个来源：一是由中原地区传入，二是根据中原地区传入的进行仿造，三是本地创造。

青铜器从中原传入广西主要是在商末周初，主要为铜卣，数量极少，器物不大，但造型精美，工艺复杂，纹饰丰富，有的刻有铭文，与中原出土的同时期器物相似。代表器物有武鸣商末周初牛头提梁铜卣、兴安商末周初天父乙铜卣等。

根据中原传入的青铜器仿制的主要有罍、甬钟和尊，时间约在西周中晚期开始，基本上外形与中原和楚式青铜器相似，但纹饰等则带有鲜明的本地特征。广西所出土的铜罍外形与中原地区的相似，器形呈“亚”字，圆腹，下附双层高圈足，肩部焊接一对相背的耳，造型为动物神兽，肩腹间的纹饰则与楚式相似，不过又带有本地特色。由此可见是本地仿中原与楚式青铜器而铸的器物。铜甬钟也与中原的相似，外形多为圆筒直甬式，甬中空，与体腔相通，甬上的旋很细，枚细而尖，还有双叠式的，纹饰大量运用栉齿纹、叶脉纹、圆圈纹、云纹、雷纹等。广西仿照中原和楚式而有所创造的青铜器是铜尊，代表器物有恭城春秋晚期蛇戏蛙纹铜尊、贺州战国麒麟尊等，其中恭城春秋晚期蛇戏蛙纹铜尊的蛇蛙题材，带着很浓的本土色彩。

武鸣马头镇的先秦墓葬，出土了众多地方特色浓厚的青铜器和砂石铸范，证明当时该地已有青铜器铸造。铸造青铜器除了用石范，还用泥范，或两者结合铸造。铸造工艺有浑铸法、铸接法和铸后焊接法，并且当时匠人已掌握热处理和退火技术。从目前出土的青铜器看，广西本地制造的只是小型的器物。

这些广西本地创造且特有的青铜器有盘口鼎、羊角钮钟、柱形器、人面弓形格剑、扁茎短剑、双肩铲形钺、靴形钺、竹叶形刮刀、铜鼓等，此类器物在别处没有或少见，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盘口鼎又被称为“越式鼎”，其基本造型如盘子，无盖。口沿外折上耸，外侧有一对对称的绳索状半环耳，有的两耳间连有链状提梁。有三足，呈等边三角形。器身朴素，无纹饰。这类鼎在桂东北和桂东南地区的春秋战国墓中均有出土，北方则未见，形制与中原常见的器形迥然不同，独具地方特色，是广西先秦青铜器代表性器物之一。

羊角钮钟是战国至西汉时期流行于岭南地区的一种打击乐器，广西的浦北县、容县、西林县、恭城瑶族自治县和贵港市、柳州市等均有发现。其器形极富特点，呈半节橄榄形，上小下大，中空，钲部上端有一个竖长方形的透穿孔，顶上有两个羊角状的钮。钟面上有的饰有翔鹭纹、云雷纹、弦纹等花纹图饰，也有的素面无纹。羊角钮钟有的成组出现，同组形体有大小之分，音频有高低之分，可以成组演奏，也可以与铜鼓及其他乐器伴奏。

柱形器应是棺架上的柱头饰，顶端多为一立人俑，也有的为一立禽或兽，其形象塑造简单，显得古朴自然，可视为较早的、独立的圆雕。这类器物在恭城、平乐、象州等地的春秋战国墓中均有出土，而且往往为四件一组，是广西先秦青铜器中较有地方特色的一种器物。

人面弓形格剑是一种特殊短剑，仅见于战国时期的岭南地区，在广西的田阳县、柳州市柳江区、灵山县和贵港市等地均有发现。其剑身较短如匕首，剑格弯曲如弓，剑身铸有人面图案及其他装饰纹样，图饰精美。

广西出土的青铜钺的数量最多，先秦时期的墓葬几乎都有出土，其形制也最为丰富，大致可分为五大类型十三个亚型，有铲形、斧形、扇形、“凤”字形和靴形等，其中以铲形、扇形和靴形数量居多。青铜钺器身有的饰云雷纹、弦纹、树枝纹、蕉叶纹、锯齿纹及各种人物图案，也有的素面无纹。这些青铜钺与中原和邻近地区常见的青铜钺形制差别较大，具有明显的本地特征。

广西最富有地方特色的青铜器是铜鼓。广西铜鼓在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就已出现，是广西的骆越先民吸收了云南铸造铜鼓的技术制造而成的。这一时期的铜鼓类型为万家坝型和石寨山型。

在陶器制造方面，制坯和烧制工艺已有了较大进步，出现了陶纺轮，制坯以轮制为主。从用料上分为泥质陶和夹砂陶两类，泥质陶又分为硬陶和软陶。纹饰以拍印的几何形云雷纹、曲折纹、夔纹、“米”字纹、方格纹为主，也有刻画纹，个别器表甚至有点滴青绿釉。几何印纹是这一时期陶器最突出的特征。

这个时期的广西陶器仍处在低级的发展阶段，但相比史前，也有了一定的发展，造型更丰富了，形体也有所增大，纹饰更为多样化，其中水波纹的运用承接了史前陶器的纹饰，但更为细腻柔美，也体现了广西自然环境的特点。

第三节 具体美术作品

一、青铜器

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广西所发现的先秦时期青铜器中，年代为商代的有7件，西周时期的有128件，春秋时期的有44件，战国时期的有654件。这些青铜器以兵器和生产工具数量最多，但在造型和工艺上，容器和乐器最能体现广西先民的审美观念。先秦时期，广西的青铜器以小巧玲珑为主，大型器物少见。其器形虽小，但造型别致，纹饰精美，具有典型的本地特色，有的堪称艺术精品。其中，柱形器和柳州飞机场出土的铜牛，可看作是独立的圆雕艺术品。

1. 商末周初牛头提梁铜卣。

铜卣是古代的盛酒器。1974年，在武鸣县马头乡（今南宁市武鸣区马头镇）全苏村出土了一件商末周初的牛头提梁铜卣，这是迄今为止广西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青铜器。铜卣通高40厘米，腹部宽19.4厘米，重10千克。器物整体造型精美，纹饰繁缛，铸造工艺相当复杂。器物上部有提梁，高盖，腹下部稍鼓，底有圈足，身、盖四面有高耸的扉棱。通体以云雷纹为底纹，配饰三重花纹。盖面和腹部饰以浮雕式的兽面纹，兽目、眉、耳凸起，目似圆球，瞪大睁圆，眉若卧蚕，眉尖突出于器外，给人狰狞、威严的感觉。盖上的两道兽面纹为左右向，腹部的两道兽面纹为前后向，上下左右错开。盖沿、颈部、圈足各饰有一圈夔纹，夔身上又饰勾云纹，繁复而有狞厉之美。盖顶有钮，钮由六道蝉纹聚合成瓜棱形。盖沿的夔向右行，颈部的夔向左行，相映成趣，富有变化。盖的左右棱脊伸出，脊的侧面呈圭形，有阴线蝉纹。提梁呈弓形，由两两背向的夔组成三角带，三角带内也填饰蝉纹。提梁两端有牛头形，牛角和脸部亦有阴线刻纹，牛头造型写实，形象生动，简洁概括，具有装饰性，表现出了牛的温驯神态，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盖内有一“天”形铭文，为“天”或“子”字。整件器物造型精巧秀美，通体布满纹饰，错落相间，高低起伏变化丰富，构图严整，刻镂精美，抽象装饰与具象写实并存，手法多样，线刻与浮雕并用，有着极强的立体感和层次感，是广西不可多得的先秦青铜器精品。

这件铜卣的造型、纹饰和铭文均具有明显的中原青铜器特点，应不是广西本地铸造的，而

是从北方传来的，很有可能是古骆越人在与商王朝的交往中获得的赠品。



◎商末周初牛头提梁铜卣

2. 商末周初天父乙铜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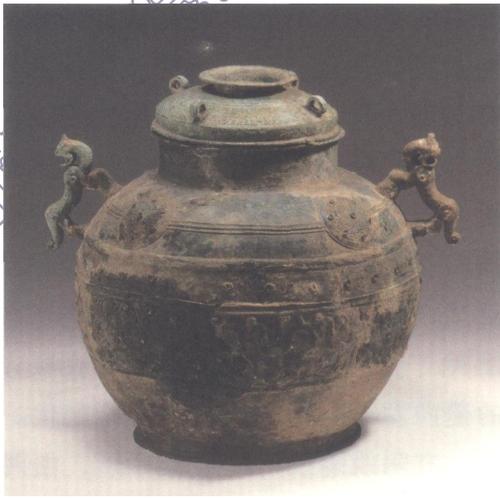
1976年，在兴安县发现了一件商代晚期的兽面纹铜卣。铜卣通高22.8厘米，腹部宽15.3厘米、深11.8厘米，足高2.5厘米，重1.6千克。铜卣盖已失，提梁为陶索形且置于左右两脊之上，颈部饰有夔纹，腹部两面饰以浮雕兽面纹，器底有铭文“天父乙”三字。从器形、提梁、兽面纹的结构和铭文等特点来看，该铜卣具有明显的商代晚期风格，与黄河流域出土的商代晚期铜卣相似，应是当时由中原地区传入。

兴安县地处湘桂走廊，湘桂走廊是古代广西通往中原最便捷的通道。铜卣的发现，说明兴安是中原文化向南传播的中转站。而湖北、湖南发现大量的商文化遗址，说明广西的部族正是通过这些地区间接地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

3. 春秋时期双虎耳蟠螭纹铜罍。

铜罍也是盛酒（或盛水）器。双虎耳蟠螭纹铜罍是1971年在恭城县嘉会公社秧家村出土的。该器通高39厘米，口径20厘米。直颈，鼓腹，圈足，有盖，盖上有圆圈顶和四环耳。肩部有两个相背的兽形耳，兽如虎，做站立回首状，以圆条状形体塑造，虎身虽不粗壮，但矫健有力。虎如攀爬状，扭颈回头，大张口，身体弯曲，尾巴上卷，双腿用力蹬地，造型简洁有力而神态生动传神，让人过目不忘。兽身各部位的流线形曲折，流畅而富有韵律，极具美感，在表现手法上，既写实传神又富有装饰意味。盖上饰蟠虺纹，颈部无纹，肩部中间有凸带纹一道，带上缀圆涡纹，腹饰蟠螭纹、蟠虺纹各一道，间以凸带纹、凹带纹、绳纹各一道，纹饰细密。整体纹饰上疏下密，由疏渐密，上疏突出了双虎耳，疏密节奏明确，给人以舒服的视觉感受，显示出匠人高超的形式美感把握能力。

这件铜罍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应为中原传入。其兽形双耳，为广西先秦时期雕塑造型表现的精彩佳作。



◎春秋时期双虎耳蟠螭纹铜罍



◎春秋时期蟠虺纹铜鼎

4. 春秋时期蟠虺纹铜鼎。

鼎是古代炊具，在奴隶制社会，它还是财富和权力的象征。1971年在恭城县嘉会公社秧家村出土的这件春秋时期的铜鼎，形体较大，圆口深腹，圜底。立耳附在口沿两侧，为粗壮的方形。底三足为马蹄形，上部圆厚，下部劲健，象形而生动，富有力度感。耳内外、口沿下和腹部各饰一周蟠虺纹，腹部间以两周绳索纹，腹下部饰一周三角纹，纹饰简洁。鼎足上端饰有高浮雕的饕餮纹，为器物纹饰最繁复之处。整件器物造型浑厚凝重，纹饰简洁纤细，是典型的楚式鼎。

5. 春秋晚期蛇戏蛙纹铜尊。

这是1971年在恭城县嘉会公社秧家村出土的一件盛酒器。原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这件酒器小巧玲珑，高仅16厘米，口径16.8厘米，足径12.3厘米。口如喇叭，下腹部圆鼓，底为矮圈足，造型与中原地区同时代的铜尊十分相似。



◎春秋晚期蛇戏蛙纹铜尊

尊身的纹饰特别，肩部和腹部以精细的雷纹为底，各铸以四组半浮雕式蛇戏蛙的图案，每组两蛇一蛙。两蛇蜷曲，头朝上，两两相对，共同顶住一只青蛙。青蛙扁平，四肢平展，匍匐在地，似要跳离。蛇头高高昂起，立体突出，蛙身也高出器外，形象非常生动。而两蛇头突出

之处，也可当作抬举器物的把手，构思精妙。

整件器物纹饰细密，显得精致秀美，形象生动，体现出工匠高超的表现能力，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展现了具有南方水乡浓厚地域色彩的生活图景。整体布局的繁与简，高与低的关系处理到位，艺术表现与实用功能的结合珠联璧合，堪称杰作。

蛇和蛙都是瓯骆先民的崇拜物，蛙蛇相戏的纹饰是百越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史料中记载百越先民有文身的习俗，他们把蛇文刺在身上，以祈求生产生活的平安。桂西的壮族则把青蛙视为雷神的女儿而加以崇拜。恭城出土的这件铜尊，说明了广西在春秋时期，既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同时又创造出体现农耕文明，有本土地域特色的文化。

6. 战国麒麟尊。

这是战国早期贵族使用的大型青铜酒器，1991年出土于贺县沙田乡（今贺州市沙田镇）龙中村红珠山一座岩洞墓中。该器高53.7厘米，长42厘米，重21.5千克，因外形似古代早期传说中的麒麟而得名。麒麟尊头小腹大腿短，憨态可掬。四腿犹如负重前行，富有动感。麒麟眼睛小而圆凸，似乎在警觉地张望，很有神采。头上的角造型简单，颈部有环与背上的盖相系。背部为盖，盖上盘着一条龙，龙头抬起为钮，构思巧妙。麒麟的尾部攀附着一只凤，凤好奇地昂着头，踮着脚，弓着尾，伸头探视前面的龙，仿佛在做游戏，极为生动。其头部、颈部、身上、腿上刻满纹饰，精美华丽，有传自中原的夔纹、蝉纹、云雷纹和窃曲纹，也有本地独创的蛇纹和寿眉纹，由此可推测其为广西本地依照中原样式并融入地域文化而作。

这件酒器构思精巧，造型古朴可爱，形体端庄，纹饰精美，集三大神兽麒麟、龙和凤于一身，体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也是富贵和地位的象征，是一件实用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青铜器。此尊的造型融合了楚、越和中原三地的特点，在别处并未发现相似造型的器物，故殊为珍贵，原件已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战国麒麟尊

7. 人面弓形格云雷纹铜短剑。

这把短剑是2002年从南宁市邕江捞出的，是战国时期的兵器，无剑首。柄呈扁状茎，中部束收，近格处加宽。剑格两端微上翘，剑格与柄连接呈弧线。剑身起脊，最宽处在中部，平缓向前收束，前端聚收成锋。以剑脊为中线，两旁有凹槽呈“Y”形，边上分布着四处如太阳

光芒般的放射形短线。近格处有一菱形凹槽，槽内以阳线突起饰人面纹，脸形瘦削，形象抽象。该剑纹饰精美，线条流畅，造型极具艺术性，是一件完美的艺术品。



◎人面弓形格云雷纹铜短剑

广西出土的青铜短剑是战国时期岭南地区特有的器物，短小而精美。具有代表性的还有1980年出土于灵山县石塘公社（今石塘镇）的人首纹青铜剑。该剑是此类青铜短剑的上乘之作，现藏于灵山县博物馆。该剑通长39厘米，剑身上部饰有人面图案，人面整体由凸线构成，眉、目、鼻、口均以阴线刻成，纹饰精美。

8. 云纹三角形铜匕首

这是1992年从南宁市邕江捞出的战国兵器，此类匕首在武鸣战国墓也有出土。该匕首柄长身短，扁茎，无格，宽扁叶，形似锐角三角形，截面为菱形，匕身起脊，匕首形状较为别致。茎首斜边，两边各有两齿突出。茎部刻满纹饰，纹饰呈三角形直入匕身中部，较为特别。茎部纹饰分为六层，根据不同的形状镂刻不同的纹样，为细线云纹和凿点纹，叶面浅刻纤细的栉纹、三角形细线纹和眼状纹。整件匕首造型别致，纹饰精美，几何形的组合富有创造性，这种造型在兵器中极为鲜见。在这种造型形式中，我们不难看到鲜明的地域审美观念的呈现。



◎云纹三角形铜匕首

二、铜鼓

铜鼓是我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的传统乐器、礼器和权力重器，是财富的象征。从汉代起，史书就有对铜鼓的记载。《后汉书·马援传》李贤注引裴氏《广州记》说：“俚僚铸铜为鼓，鼓唯高大为贵，面阔丈余。”《晋书·食货志》载晋王朝曾下诏令：“广州夷人宝贵铜鼓，而州境素不出铜，闻官私贾人皆于此下贪比轮钱斤两差重，以入广州，货与夷人，铸败作鼓。其重为禁制，得者科罪。”晋代广州包括广东和广西大部分，当时因为铸鼓太多，竟导致铜的产量供不应求，可见当时铸铜鼓风气的盛行。《太平广记》卷二〇五则记载：唐贞元中，“南蛮酋首之家，皆有此鼓也”。可见，当时铜鼓在南方是较为普遍的。

对广西铜鼓的发现，史书也有很多记载。唐刘恂《岭表录异》记载：“咸通末，幽州张直方贬龚州刺史。到任后，修葺州城，因掘土得一铜鼓。任满，载以归京。”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载：“铜鼓，古蛮人所用，南边土中时有掘得者。”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载：“广西土中铜鼓，耕者屡得之。”明魏濬《西事珥》载：铜鼓“土人偶于土中掘得”。清金鉷《铜鼓记》载：“雍正八年春，粤西北流县农民获铜鼓一，完好无剥蚀，翡翠丹砂，古色斑驳。”

铜鼓最早起源于云南，大约在春秋晚期传入广西，此后，广西先民加以发扬光大，成为本地域和民族的文化标志。铜鼓最初是作为炊具之用，即釜，后才演变为敲击乐器。作为当时的重要器物，铜鼓的造型和装饰极为精美。鼓面是重点装饰部分，中心常为太阳纹，外围以晕圈装饰，与鼓边接近的圈带上多铸有小型圆雕。圆雕多为青蛙，也有骑士、牛橛、龟、鸟等。鼓胸、鼓腰也饰有精美的图纹。鼓足素。图纹是在模坯上用镂刻或压印的技术制作而成，图形精美，线条流畅。图纹分绘画性纹饰、图案纹饰两类。绘画性纹饰有太阳纹、翔鹭纹、龙舟竞渡纹和羽人舞蹈纹等，图案纹饰有云雷纹、圆圈纹、钱纹和席纹等。这些纹饰常以重复或交替的形式出现，在构图布局上疏密相间，富有节奏韵律感。鼓胸装饰带的图案多为长卷形式，鼓腰装饰带的图案则多是独立成篇，循环往复。铜鼓按流行年代、地域分布、形制、纹饰等可分为八种类型，分别为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冷水冲型、遵义型、麻江型、北流型、灵山型和西盟型。总体上看，石寨山型造型写实精美；冷水冲型铜鼓鼓面复杂并有圆雕装饰，图案抽象化；北流型器形庄重，纹样繁复。

最早的铜鼓类型是万家坝型，其年代在春秋战国时期。接着是石寨山型，其年代在战国至秦汉时期。

广西早期的万家坝型铜鼓，一面出土于今田东县林逢镇和同村大岭坡春秋晚期墓，两面出土于今田东县祥周镇联福村南哈坡战国早期墓。这三面铜鼓鼓面小，鼓胸外凸，鼓腰极度收束，鼓足短矮，足外撇，鼓耳细小，纹饰简朴粗犷，与云南楚雄万家坝出土的万家坝型铜鼓类似，是铜鼓的原始类型。

石寨山型铜鼓是成熟期的铜鼓。其造型古朴大气，鼓面宽大，胸部突出，足部变高，纹饰以阴纹为主，对称布局，刻画细腻，丰富华丽。鼓面中心为太阳纹，光芒与光晕浑然一体，三角光芒间饰斜线。太阳纹之外是数道宽窄不等的晕圈，有宽晕和窄晕。宽晕是主晕，饰以旋转飞翔的鹭鸟。窄晕中饰锯齿纹、圆圈纹、点纹等花纹带。鼓胸部的纹饰与鼓面相同，但主晕则

是人物划船的绘画图案。腰部除晕圈组成的纹带之外，还有由竖直纹带分隔成的方格，方格中饰牛或砍牛仪式和用羽毛装饰的人跳舞的图案。1991年在贺县沙田乡龙中村的一座战国时期岩洞墓中发现了一面石寨山型铜鼓，1997年田东县祥周乡（今祥周镇）甘莲村锅盖岭战国墓也出土了一面石寨山型铜鼓。

1. 雷纹三角形带纹铜鼓。

1994年在田东县林逢乡（今林逢镇）和同村大岭坡出土，属万家坝型，现藏于田东县博物馆。鼓面不大，中心稍微隆起，沿中心有11芒不规则的太阳纹，无晕圈。鼓胸外撇，素面无纹。胸腰间有两对小扁耳。腰上半部以纹饰纵向分格，纹饰为两边绳索纹夹对角三角纹。腰下半部各饰两道回纹和绳纹，绳纹在上，回纹在下。绳纹之上还有一道“人”字纹。所有纹饰均为阳纹，纹饰古朴粗犷，线条细挺流畅，整体造型上小下大，显得稳重敦实，浑厚古朴。



◎雷纹三角形带纹铜鼓



◎龙舟竞渡纹铜鼓

2. 龙舟竞渡纹铜鼓

1991年在贺县沙田乡龙中村战国时期岩洞墓中出土，属石寨山型铜鼓。通高26.6厘米，面径36厘米，胸径42厘米，腰径34~42.6厘米，底径45厘米，重14千克。鼓面宽大。胸部短，突出圆润。束腰稍长，外撇。足亦稍外撇。胸、腰、足界线分明。胸腰间有两对桥形编织纹扁耳。鼓面中部的太阳纹光体与光芒浑然一体，共18芒。三角光芒之间填斜线纹。太阳纹外分6晕，大小各3晕。小晕分别饰点纹或锯齿纹，大晕（主晕）素。胸部有5晕，中部主晕饰对称的四组龙舟竞渡图案，图案随龙舟的造型呈半椭圆形底。舟首尾高翘，舟尾下有同定短舵。舟身饰栉纹、“人”字纹和点纹。舟上蹲坐四人，皆裸体文身，头发后飘，发尾齐平。其中一人蹲坐较矮似指挥状，另三人屈腿，双手屈伸向后划桨。人物身体前倾用力划船的动态，以及头发后飘的形态，把竞赛的激烈场面和舟行水上的速度感表现了出来。船头有一只花身水鸟，头向左看，形态生动。所有造型均为单线勾勒，线条简洁，但形态表现生动，展现出当时匠人良好的造型能力。腰部主晕为10条以羽状纹为主体，侧为突点纹的竖直纹带，把鼓腰分隔成10个方格。除在合范痕的两格素面外，其余每格均饰一牛，一公一母相间。牛以曲线刻出，公牛形体夸张，阴茎突出，母牛造型温驯。足部为素面。把龙舟竞渡这一重要的节庆活动和牛这一重要财产表现在铜鼓这一重要的器物上，体现了人们对生活的关注，注重对身边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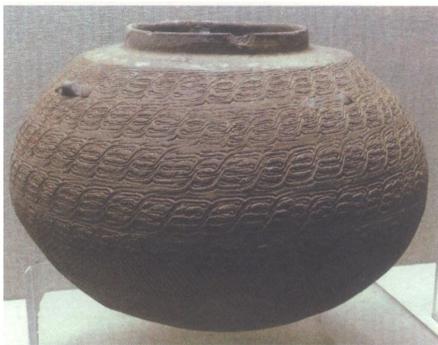
的表现而不是过多地关注神权、皇权，这是广西先民由来已久的审美特质。整体纹饰以阴线刻出，疏密相间，曲直对比，布局对称，图案装饰性与写实性并存，丰富华丽，堪称精品。

三、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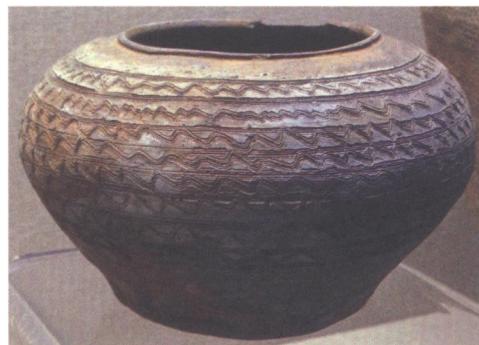
先秦时期的陶器，在制坯和烧制工艺方面较史前有了较大的进步，出现了陶纺轮。所制造的陶器，器形和纹饰比史前更精美，有的器物也比史前更高大。大部分陶器的纹饰运用了对称、重复叠加的艺术手法，与器形形成协调的对比、强化关系，增强了形式美感，这是先秦时期陶器的审美特征。

1. 夔纹方格纹四系陶罐。

1963年在贺县桂岭公社（今贺州市桂岭镇）出土，为春秋时期器物，属于与春秋时期青铜器共存的几何印纹硬陶器。直口，短颈，鼓腹，圜底，造型圆润饱满。肩部置四横短耳。肩至腹中部满饰夔纹，计有四层半。夔纹纹样复杂精美，多层组合，呈现出华美的装饰效果。腹中下部饰方格纹。夔纹与方格纹相接处界限模糊，互相交融，有如现代电脑技术两张图片虚化相接，呈现出特别的艺术效果。该陶罐胎质细腻，烧制火候较大，应为轮制窑烧。纹饰清晰，模仿中原地区青铜礼器的装饰图样，反映出中原文化对广西的影响。几何印纹陶器是先秦时期百越文化中最富有特性和代表性的器物，而此件又堪称代表。



◎夔纹方格纹四系陶罐



◎水波纹陶甗

2. 水波纹陶甗

1974年在平乐县银山岭74号墓出土，为战国时期器物。高12.5厘米，口径11.2厘米。为泥质灰陶，烧制火候较大，胎质坚硬。直口，圆腹，平底，腹鼓腰收，造型优美。无盖无耳，肩部和腹部刻画水波纹，共有8层，水波纹以横线相隔。水波纹的曲线有急有缓，急处如波涛汹涌，缓处如波光粼粼，让人如处泽国。波浪层层叠叠而来，美不胜收。其刻线随意，似乎信手拈来，但又流畅自然，反映出匠人熟练、高超的技艺，让人能感受到创作者气定神闲、胸有成竹、潇洒自如的创作状态，以及其热爱生活、乐观豁达的性格，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水波纹是先秦时期百越先民陶器上的一种常见纹饰。

3. 兽耳三足陶甗。

1974年在平乐县银山岭3号墓出土，为战国时期器物。直口，广肩，斜宽腹，尖底，三足。肩部有一对兽形环耳，兽形概括抽象，如青蛙从环中钻出，是从生活中获取灵感并经过艺

术加工处理的创作，让人产生美好的艺术想象。为泥质灰陶，胎质坚硬，烧制火候较大，轻敲时声响清脆，腹侧有黄绿釉斑，已经达到原始瓷器的水平。



◎兽耳三足陶甑



◎单柄三足陶罐

4.单柄三足陶罐。

1974年在平乐县银山岭108号墓出土，为战国时期器物。为盛器，高15厘米，口径9.5厘米。直口，椭圆形腹，平底，三足。整体造型圆润饱满又精巧别致。单柄，置于腹一侧，为弓形鬃耳，曲线优美。耳的上端截切成锯齿状，从侧面看，整条柄像是一条美腿赤足从罐底伸出搭在颈上，造型优美。两侧刮削起棱，下腹近耳处有刻画符号。腹部通体施弦纹，手工划痕，深而整齐，具有绘画性而不是规整划一，颇具现代感。为泥质灰褐陶，胎质坚硬，烧制火候较大，器表有少量晶莹薄釉。该陶罐实为一件造型别致、形体优美、构思精巧、制作精良的实用器具。